



深刻的教训



全国人民关注的“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已经由国务院作了严肃处理。国务院根据各方面调查结果，指出这是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我国石油工业史上最大的责任事故，决定解除宋振明同志石油部部长的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而对此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记大过处分。国务院领导就这个严重事故处置不当，进行了自我批评。“渤海2号”事件的处理，不仅使石油战线广大职工，而且使各条战线的同志

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渤海2号”翻沉事故发生已9个月了，到今天才得到处理，这说明有些问题处理起来还不那么容易。但是这件事终于得到正确处理，又说明中央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解决问题是很严肃很果断的，是完全能够忠实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发展很快；五中全会以来，形势发展更快。象西藏问题、首都建设方针问题、昔阳的“西水东调”问题，以及这次的“渤海2号”问题，都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解决的。目前在我们面前既有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又有许多四化建设中新的问题，应当承认是问题成堆。但是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是同人民心连心，坚决依靠群众的。过去的事情，无论是谁决定的，只要错了，就坚决纠正。现在工作中的问题，无论是谁负责的，如果确是重大过失，就要严肃处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纵然很多，何愁不能逐步得到解决？“渤海2号”事故得到严肃、果断的处理，大大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增强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渤海2号”事故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从许多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从领导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骄傲不得。在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党对领导经济建设虽然并没有什么经验，但还是比较顺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比较谦虚谨慎，勤于学习。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滋长起骄傲情绪，于是，“一言堂”出来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多起来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就遭到挫折。但我们有些领导不但不从挫折中总结经验，虚心学习，汲取教训，反而用这样那样的帽子和棍子把正当的批评压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一贯正确”的地位，这些同志可以不顾尊重群众，可以不管实际情况，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可以不听群众和专家的正确意见。这样，错误就得不到纠正，而且一犯再犯，越犯越大。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页伤心史。很多同志由此得到了教训，得到了进步。非常可惜，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愿意虚心地学习这个痛苦的教训。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没有失败过，至少他们自己这样感觉。这次石油部的领导所以犯错误，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总是正确的。石油战线全体职工，尤其是大庆油田的职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石油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荣贡献，石油部在组织领导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总结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但是，功劳再大，永远也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石油部某些领导同志由于被成绩冲昏了头脑，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一辈子用下去了，再不需要向专家学习，向干部和群众学习了，再不需要研究不同的意见了，这就使他们不能不造成“渤海2号”的令人痛心的惨剧。本来，搞现代化建设，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懂、不熟悉。就以海上石油勘探来说，这是一项新的事业，海上作业比陆上复杂得多，危险也大多，应当更讲科学，更讲安全，更加重视科学管理。但是石油部有关领导既不认真学习，又不严格培训职工，建立起严格的规章制度。“渤海2号”从国外引进7年来，直到翻沉之日，竟连稳定性计算书等重要资料也没有翻译过来！尽管如此，只要虚心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认识到这次迁移井位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危险，那么，停止这一次冒险行动，避免这一次重大的不幸事故，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比一切敌人更危险的是骄傲，骄傲使一些同志丧失了正确判断情况的能力，甚至也丧失了正确总结教训的能力。从1973年以来海洋石油勘探发生了各类大小事故1,042起，死亡职工33人，他们仍是无动于衷，终于发生了这次悲惨的事故。这个事实说明，一旦骄傲占了上风，就连自己过去提倡的“两论起家”、“老三四严”、“两分法前进”这类体现了正确思想路线和正确作风的好经验也丢掉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教训啊！同志们可以想想，如果石油部某些领导能够用“两分法”对待自己，如果他们能够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和“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种大庆的优良作风，象“渤海2号”这样的严重事故不是完全可以避免吗？

在生产建设中，发生某些不能预料和不能抵抗的事故，确实难以完全避免。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任何人对职工安全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的借口。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料和抵抗的事故，也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提高自己今后预防、抵抗的能力。如果是责任事故，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那就更应该认真进行检查，并作严肃处理，以便深刻接受教训，切实改进工作。这才是对阶级、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表现。应当指出，宋振明同志在8月23日给国务院的检讨报告的态度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们热烈希望，石油部领导在国务院作出决定以后，能够进一步查明和处理对这一事故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员，认真纠正石油部和海洋石油勘探局在这次事故中的种种错误，并且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总结出应有的教训，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以便团结一致，继续努力，积极完成1980年石油勘探和生产的艰巨任务。石油部过去工作的巨大成就掩盖不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在正确地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以后，石油部的工作必将取得更光辉的胜利。

多年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赏罚不明、纪律废弛的现象。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除了明显地触犯刑律，很少因为工作上的错误和过失而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即使由于瞎指挥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浪费，也很少象在建国初期那样受到处分。这种赏罚不明的现象，不但不利于各级领导干部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挫伤了他们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我们并不主张惩办主义，不能把对干部的必要的处分作为推动工作的主要方法。对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仍然应当以教育为主。但是，犯有严重错误和过失，造成了恶劣后果的，就必须按照情况给予应得的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处分，也是一种教育。只有赏罚分明，纪律严明，才能使干部对自己严格要求，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使广大群众相信我们的党纪、政纪和法律不是只对普通人才起作用。这次对宋振明同志和康世恩同志的处分，不但对石油部门，对整个经济工作部门，而且对全国全党全军，对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基层组织，都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和推动。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们整个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状况，我国整个党纪、政纪和法律，都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必将以更加加倍的成就，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事实证明，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前进，我们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

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决定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定，为了加强对全国能源的管理，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的名单

- 一、任命余秋里副总理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免去余秋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
- 二、任命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免去余秋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
- 三、任命万里副总理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免去王任重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
- 四、任命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免去吴波德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决定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五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结束 通过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

通过提请人大会议审议的国籍法草案等；通过律师暂行条例等；任命万里姚依林万里副总理分别兼任能委、计委、农委主任，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今天结束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这个草案将作为建议，提交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议程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1980年、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并分别作出相应的决议。

——听取和审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的决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讨论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分别作出相应的决议。

——华国锋总理讲话。

——关于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安排。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今天下午结束。

这次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讨论和审议，圆满地完成了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通过了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

在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提请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国籍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个人所得税法草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通过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通过了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

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

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免去余秋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万里副总理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免去王任重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免去吴波德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新任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55岁。1939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曾任财政部司长、副部长等职。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解除宋振明的石油部部长职务。

在今天的全体会上，余秋里代表国务院就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议案作了说明。他说，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是为了加强能源的管理，统筹安排能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拟定国家的能源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定能源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国家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建设；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新能源的科学研究、试验和开发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研究和推广开发、节约能源的新技术。

今天下午的全体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乌兰夫、韦国清、谭震林、赛福鼎、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肖光先、朱德纯、史良副委员长出席了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五届政协常委会十一次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五届政协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今天在北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蔡啸在会上对这一书面报告作了说明。会议还通过了五届政协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通过任命彭

国务院关于“渤海2号”的决定代表人民的意志 五届政协常委会十一次会议通过动议拥护国务院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五届政协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今天通过一项动议，赞成和拥护国务院作出严肃处理“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决议。

这项动议是常委委员徐逸雄提出的。他说，国务院这一公正严正的决定，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对党和政府极大的信任，它昭示全国人民，我政府决心实现四化，实行法治。

这项动议得到了与会委员们的热烈响应。

刘澜清说，这项动议非常好。国务院作出这样处理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表明了我们的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这一处理是严肃的，合情合理的，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

李维汉说，国务院这一决定，对于贯彻法制，贯彻政府纪律，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个榜样。石油部的主要负责人受到解除职务的处分，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受到记大过的处分。现在不是有一种舆论吗：“老虎屁股摸不得”，“官官相卫”，这一决定说明了不管是谁，违犯了纪律、法律，就一定要处分。我赞成这一处理，我为国家高兴，为法律、为纪律高兴。

钟师统说，这个决定实践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对我们贯彻《准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吴亮平也发表言表示赞成国务院的决定。

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和大港油田职工认为 国务院的决定将推动我国石油工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继绳、李和信报道：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传到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和大港油田以后，广大职工精神大振，一致拥护。大家认为，这一决定表达了广大石油工人的意愿，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渤海2号”钻井队队长刘学的爱人张影和几位死难家属听完广播后十分激动。她们说，党中央这样看重我们工人生命的价值，作出这样坚决果断的决定，完全符合我们心意，衷心感谢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关怀。国务院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感到亲人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悲痛的心情得到了宽慰。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海洋石油事业做出贡献。一些原来在“渤海2”工作，“渤海2”翻沉时在陆地休假的人说，去年听说战友牺牲的消息时，大家哭成一团，而海洋石油勘探局有些领导还说我们情绪不正常，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不让我们“乱说”。8个多月来，这些同志一直压抑着悲痛，当从广播中听到国务院决定，完全符合我们心意，衷心感谢党中央、国务院

说出了我们长期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说明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我们的国家是维护工人利益、尊重人民意志和权利的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局和大港油田的广大干部说，国务院的决定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地位多高、贡献多大，只要你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着急，而石油部领导，就同普通群众一样承担责任。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

大港油田的一些技术干部问题已说明，石油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们说，由于石油部某些领导人采取“杀鸡取蛋”、“掠夺性开采”方针，使油井压力急剧下降，油田遭到破坏，影响原油产量。在大港油田工作的一些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形势大好，而石油产量一直踏步不前。我们既痛苦，又着急，而石油部领导，还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大象屁股推不动。他们认为，国务院这一重要决定是推动我国石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

美国副总统批评里根的对台立场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纽约消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昨天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蒙代尔在纽约州凯亚梅沙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里根处理他的第一件国际事务就犯了错误。他说，“对于里根的立场地球上只有一个大国喝采，这就是苏联。”

蒙代尔还说，“里根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两个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澄清可以掩盖他的混乱立场”。

本报讯 卡特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杰克·沃森24日在华盛顿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指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由于要求美国同台湾恢复正式关系而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沃森说，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立场将会改变由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由福特总统和现任的卡特总统继续执行的美国政策。

坚决拥护国务院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

上海市领导同志对照“渤海2号”事故查漏洞摆问题

提高认识改善对经济工作领导

新华社上海8月26日电 上海市副市长、市计委主任陈锦华今天下午在他主持的经济领导同志负责人会议上说，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对全国经济战线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一定要把这个教训变成我们共同的教训，来改善我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国务院的决定公布后，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今天上午，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办公会议上，书记们讨论了这个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今天向全市发出学习国务院决定的通知。市经委党组和许多工业局党委都召开了会议，专门进行了学习讨论。

在这些会议上，领导干部们回顾历史，联系实际，对照“渤海2号”事件，查漏洞，摆问题，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陈锦华在会上说，国务院的决定不单是为了处理一件重大事故，它的深刻意义还在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建设四化才是对的。我们是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搞四化呢，还是搞唯意志论、主观蛮干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用后一种错误的态度，四化就会走弯路，搞不好。副市长、市建委主任杨瑞说，三中全会要求各级干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改变领导作风，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往往不尊重客观规律，从主观出发，不讲民主，少数人说了算，搞瞎指挥。这是很不对的。

许多领导干部在学习讨论中都认为，国务院领导以身作则，公开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给自己以很深刻的教育。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说，过去发生了事故，有些干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甚至隐瞒事故、掩盖真相，阻挠调查。在处理时又常常出现“工人责任跑不掉，干部责任层层包”的不合理现象。市冶金局局长陆铁夫说，过去处理事故，对下面处理偏重，对上面处理偏轻。这次国务院秉公办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不少干部还谈到，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勇于承担起领导责任。

在讨论中，许多干部联系了上海的实际。市经委主任周骥说，发生“渤海2号”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成绩面前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上海工交系统听到的表扬不少，一些干部也有些沾沾自喜。这很值得警惕。不注意这一条，以后也会出大乱子。事实上，上海工交部门也有不少事故，有些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差，而是由于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所造成的。只要我们各级干部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关心工人群众，切实加强管理，许多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刑上大夫 庶民折服”

北京汽车制造厂职工认真学习国务院决定

本报讯 记者翟启运、石德连报道：“刑上大夫，庶民折服，四化建设大有希望”。这是北京汽车制造厂职工学习国务院决定，认真学习“渤海2号”事故决定时的共同反映。

国务院决定解除宋振明石油部长的职务、给康世恩副总理记大过的处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们说：十年浩劫，破坏了党纪国法，“刑上大夫”的封建思想蔓延，有法不依，有法难依。出了问题，抓小不抓大，抓下不抓上，抓轻不抓重，甚至文过饰非，“丧事当喜事办”。这样就不能教育干部，也不能教育群众，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国务院对康世恩、宋振明同志这样高级

干部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说明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国务院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封建的“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那一套，为全党全国按党国法办事做出了榜样。

北京汽车制造厂还通过学习讨论增强了安全生产观念。分管生产和安全的副厂长周智同志说：“安全生产是工厂的头等大事，国务院对‘渤海2号’事故的处理，也是对我们领导干部一次严重警告。我们一定要从中间吸取教训，虚心听取工人、技术人员意见，加强安全生产，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抓好安全教育和劳动保护工作，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赏罚分明有希望

编辑同志：



看到报上登出的国务院决定严肃处理“渤海2号”翻沉事故，给石油部副部长宋振明以解除部长职务的处分，给康世恩副总理记大过处分，很有感触。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应当是赏罚分明。过去，在报纸上只见到这个国家的部长有失职行为引咎辞职，那个国家的大臣犯了过失被免职，很少看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因为失职而受处分的。我们常常想，为什么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到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做不到呢？这次国务院严肃处理“渤海2号”事故，处分了负有重大责任的部长和副总理。这个头开得太好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平时在厂矿企业，工人和一般的干部出了责任事故，是一定会受到处分的，有些还将受到刑事处

分。但是有的“官”大一点的领导干部瞎指挥、官僚主义造成了责任事故，至多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说什么“我应该对此事故负主要责任”等等。可他又凭什么来负这个责任呢？到头来受处分的往往还是具体的操作者、执行者。其实，领导干部失职造成的危害比一般群众严重得多。长期以来赏罚不明，既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又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再这样下去，大家怎能服气，又怎能“同心同德”干四化呢？

假若我们早些做到有功就赏，有过则罚，那么象石油部海洋局这5年内就可能不会发生大小事故1,042起，甚至这次的“渤海2号”事故也就可能避免。国务院的决定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我们今后就是要这么办，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什么人，无论普通群众，还是领导干部，都要实行“有言必践，过必罚”，赏罚分明。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北京东风无线电厂 钱 辛

石油企业领导干部在学习讨论中表示

成绩面前不停步 困难面前不气馁

本报讯 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受到来京参加石油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的同志们的坚决拥护。

石油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是石油部党组于8月25日下午召开的。会上，石油部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宋振明同志就“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作了检讨。晚上，出席会议的同志收听国务院处理“渤海2号”事故决定的广播。在26日的分组讨论会上，大庆、华北、大庆、胜利、南阳等油田以及一些炼油厂、石油工程公司、海上勘探指挥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在发言中认为，国务院决定解除宋振明同志石油部部长的职务，给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以大过处分，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对宋振明、康世恩同志的爱护。大家深有体会地说，中央书记处指

出发生“渤海2号”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石油部“某些领导人在成绩面前骄傲了”，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在小组讨论会上，很多同志都认为，“渤海2号”事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同石油部某些领导不深入调查研究，缺乏科学态度，不虚心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职工意见分不开。他们批评石油部某些领导同志搞生产不是扎扎实实，量力而行，习惯于大轰大嗡，动不动就搞“大会战”，“打擂台比武”，夸大主观意志作用，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致造成很多事故隐患。

参加石油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的同志，通过学习讨论，都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期望，一定带领全体职工，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停步，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气馁，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北京市经委、建委向所属各局发出通知

联系实际吸取教训切实改进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今天上午，北京市经委、建委分别向所属各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局领导干部学习国务院关于“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联系本单位的工作实际，从“渤海2号”事故中吸取教训，切实改进工作。

北京铁路分局丰台西站的同志说，国务院对石油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错误进行这样的严肃处理，是建国30年来第一次。这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重

整党纪和坚决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决心，体现了扫除官僚主义、实现四化的决心。国务院对这次事故的严肃处理，也是尊重科学和民主的具体体现。解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不尊重科学和民主，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违章蛮干，搞瞎指挥所做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使“学费”白缴了。

华北油田领导同志认真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

遵循客观规律搞好安全生产

本报讯 国务院关于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处理决定广播后，在华北油田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26日早晨，华北油田党委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到会的党委成员和二级单位主要领导及油田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对国务院的决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油田副总工程师林振锡同志说：我衷心拥护国务院的处理决定。我深深感到国家有了希望。不是谁权大谁就没有责任，而是有法必法了。油田副指挥兼总工程师游静裕同志说：“渤海2号”事故发生后，我们陆地油田也是敲了警钟。我们油田的事故也至少同油田党委副书记李孟生同志说：“联系我们油田所发生的事故，主要原因是领导重视不够，对事故处理不严肃认真，我们一定要吸取渤海2号事故的教训。”油田副指

挥兼总工程师查全衡同志说：“渤海2号事故告诉我们一条很重要的教训，干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总是吃亏的。我们油田的开发方案就不符合客观规律，现在油田超负荷生产的状况必须改变，不然将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最后，党委副书记、副指挥王永林同志提出了三条要求：一、要组织广大干部和工人认真学习国务院的决定，提高认识；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认真搞好领导作风；要进一步搞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完善安全生产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关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访华的新闻公报

1980年8月26日于北京。

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暴风”部队副总司令、中央委员阿布·杰哈德率领的“法塔赫”代表团应中国政府邀请，于1980年8月21日至26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华国锋总理、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分别会见了以阿布·杰哈德为首的“法塔赫”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何英副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

姚依林会见联合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今天晚上会见了联合国统计司司长斯维恩·诺巴顿和夫人维南教授。姚依林欢迎诺巴顿前来了解我国统计工作并就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统计机构与我国统计机构的联系问题进行商谈。

我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龚普生于今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都柏林就任。

追究“渤海2号”翻沉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提起公诉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进行审判准备

新华社天津8月26日电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依法于昨日对“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件的被告人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正积极进行公开审判的准备。

被告人是：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副局长王兆诸、局副总调度长张德经、滨海282号船长阎永志。

今年5月7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接受天津市劳动局于4月21日就“渤海2号”翻沉事件所提出的控告后，即依法进行了审查、立案和侦查工作，现在事实已经清楚，事故性质已经明确，确认这是一起由于严重违法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被告马骥祥、王兆诸、张德经、阎永志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的规定，已构成渎职罪。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起诉书》说：“经侦查证实，‘渤海2号’钻井船的翻沉主要是违反《富士号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关于‘排出沉垫舱里的压载水，使自由液面最小’及《渤海2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关于‘如拖航距离较长或需进出港，应排出沉垫舱里的压载水，以减少吃水，降低抗航阻力’的规定，使4,859吨的压载水没有排出，加深了吃水（吃水应为4.25米，实际为9.5米），降低了干舷（应为6.78米，实际为1米左右），严重降低了船的不沉性，致使遇风浪时，海水涌进泵舱，失去平衡，船体倾斜翻沉。”

“被告马骥祥身为局长、党委书记，11月23日上午，在他主持召开的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上，当副总调度长李平汇报拖航会议所做的错误决定时，没有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审查研究，特别是于12月4日李平向局领导干部碰头会汇报了河北、山东、天津三个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后，没有引起警惕，更没有做出停止‘渤海2号’钻井船降舱、拖航的决定，表现了对国家财产和职工人身安全不负责任。”

“被告王兆诸不重视职工和国家财产安全，对‘渤海2号’钻井船队长刘学的合理建议不认真考虑；不认真审查和纠正拖航会议所做的错误决定；特别是在11月24日‘渤海2号’钻井船降舱、拖航前副总调度长李平向其汇报了河北、山东、天津三个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后，不通知现场停止降舱、拖航，对拖航表现了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被告张德经在主持制定‘渤海2号’钻井船的拖航计划中，不采纳‘渤海2号’钻井船队长刘学的合理建议，也没有按照《稳性计算书》、《渤海2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富士号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提出排出沉垫舱里的压载水，以轻率的态度做出了错误的拖航决定，因而肇致了事故的发生。”

“被告阎永志身为船长，在‘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和翻沉后人员落水的重要时刻，没有及时发出遇险国际呼救信号，争取友邻船只投入对落水人员的抢救；没有及时测报‘282号’的船位和‘渤海2号’钻井船的准确船位，对抢救落水人员很不得力，使可能减少的人身伤亡未得避免。”

天津市检察院分院自立案侦查以来，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核对了天津市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提讯了被告，询问了证人，分析了有关技术资料，听取了海洋石油勘探局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和家属的意见，也耐心地听取了事故主要责任者的不同意见，保障被告人陈述和辩护的权利。对于案件中涉及到的有关船舶、气象、海洋等专门性技术问题，还聘请有关专家进行了技术鉴定。

<*> <*> <*>
曾涛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介绍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今天下午在这里就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召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他说，将于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这次大会，会期预定为两个星期。大会将讨论和决定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今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几个重要法律的通过和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调整。他向记者们介绍了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议程草案。

曾涛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将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信心和工作积极性，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他说，驻京的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可以参加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另外两次全体会议。

接着，曾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萨空于也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将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

外国记者可以参加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关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代表团访华的新闻公报

的会谈。双方对会见和会谈的结果一致感到满意。

一、中国方面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中东问题应尽早获得全面、公正解决。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以色列必须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自决权。双方谴责以色列对

斯丹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早已存在的友好合作。

二、双方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中东问题应尽早获得全面、公正解决。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以色列必须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自决权。双方谴责以色列对

三、双方强烈谴责以色列顽固坚持侵略扩张立场，以及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种种迫害政策。双方谴责以色列对

刘仰峤因病逝世



1980年8月17日逝世，终年69岁。

刘仰峤同志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左联的活动。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刘仰峤同志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交通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湖北省委书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教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刘仰峤，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国务院高教部副部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时党委书记、秘书长。

刘仰峤同志参加革命40多年来，一贯勤勤恳恳，谦虚谨慎，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晚年身患重病，仍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工作。

刘仰峤同志追悼会8月2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关方面负责人、群众代表350多人参加。

哈尔滨建成家畜繁育指导中心

指导中心
市南郊建
生产、供
搞好家畜
采集、超

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编者按：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报刊编辑，就文艺的真实性问题进行座谈。到会同志联系文艺创作的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状况，对文艺的真实性含义、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文艺的真实和文艺的社会效果、文艺真实性和反映生活本质，以及对“写真实”口号的理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报今天发表的，就是座谈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是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之

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就有分歧；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更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重新认识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很有必要，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报准备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欢迎从事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同志和广大读者积极撰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当前的文艺实践，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说理的、自由的讨论，使真理愈辩愈明。

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

王 蒙

一

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对于一般的对象，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只有要儿才分不清橡皮奶头和母亲的乳房，只有象某件文物或某种科学假说那样的对象，才需要专门的测定。婴儿长大了自然会抛弃橡皮奶头。而有了专门仪器、科学的测定方法和专门人材，某种客观或假说的真伪最终也会是清楚明白的。由此可见，真实与否的问题，本不是一个深奥难解、玄妙莫测的问题。

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它不但排斥，而且还要想象、幻想、夸张和虚构。但即使如此，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仍然能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真实。没有人指责《西游记》或者《安徒生童话集》不真实；同样，一般人不会承认电影剧本《春苗》与《决裂》真实，虽然后二者并不乏真实的细节。在电影院和剧场里，剧本与表演以至布景道具的任何失真，都会引起观众的骚动——摇头或者嗤笑。这说明，普通道理不一定讲得清楚，读者和观众对于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还是和自己的一样好的。

但是，在文艺理论领域，真实、真实性问题的，却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进行争论而让人莫衷一是的深奥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文艺的真实性问题，不像自然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理论的真实性问题那样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讨论往往受“风”的影响，往往随“风”转变。

多年来，我们经常在一组组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中兜圈子，根据“风”向，时而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而贬低其中的一个方面。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题材的多样化与提倡写重大现实，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与写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艺术性与思想性……看吧，什么时候大家齐声强调前者，什么时候又转而强调后者，那是一个“四通八达”，牵一发而动全身，整整齐齐，不会错的。

这种讨论有时候甚至会把类似起类似吃饭与喝水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强调吃饭，连最起码地讨论不吃不喝就不能生存唯物主义原理；有时候我们又振振有词地发问：难道不喝水不吃不喝就能生存吗？人们对于水的要求不是迫切、更迫切不可离开吗？

照我们的文艺论争及早从这种“车轱辘”话中获得解脱。

二

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说服力的问题。一部作品要感人、吸引人、教育人，首先就要人信服。如果读者不信服，不但明知其假（虚构）的时候能做到信以为真，如果读者不知其假，只知其假，那么不管你的作品有多么好的用心，多么好的装潢，也是不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的。

文艺作为人们从认识上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的真实”，才能起到应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对此，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究竟怎样才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真实”呢？当前却有明显的不同理解和主张，很需要通过对讨论逐步搞清楚。

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客观对象的社会生活现象本身就有两类，一类是能够表现本质的，一类是不能表现本质、与本质无关的。因此，作家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只能写前一类现象，而不能写后一类现象。例如，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本质固然属于现象之中，但并非所有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能够反映本质，至于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远离本质的。”还有的文章说：“从某些细小的琐碎的偶然性中甚至很难揭示出必然性来。”显然，照此逻辑，作品要这样写的话，就是不会写出社会生活的假象，不能写“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和“细小的”偶然现象。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规律（它和本质是同等概念）？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它隐藏在各种现象之中，是人们无法感知的不能直接把握的。现象则是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在形式。正如列宁所说：“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持不变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流动就是涌浪在上游，荡漾在下面，”与本质的这种稳定性和稳固性相比较，一切现象都是表面的、稍纵即逝（常常消失）的。难道有本质一样稳固、稳固的现象吗？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什么是本质？就是隐藏在无数偶然现象中支配作用的东西。和必然相比，任何偶然都是细小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偶然的。当然就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作为一个感官可以直接把握的社会现象，它的爆发也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到清明节，爆发的就可能另是一个名称的群众），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天就消失了。它所包含的本质——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国家两个命运的搏斗——才是相对稳固的，它在此以前和

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不断地得到表现。同时，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笑一怒，又无不表现在某种社会事物的本质。“连泡也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具有着必然，既不可能有离现象而独立呈现的本质，也不可能有所谓“远离本质”、与本质无关的现象。就拿假象来说吧，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也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种表现。如林彪、江青一伙经常以上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一种假象，而它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混进党内并以假乱真出现的阴谋家的反动的本质的一种特殊规定，是他们不同于一般反动分子的一种表现。不描写这种假象，文艺作品就不能充分揭示这种阴谋家的反动的本质。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能表现本质的和“远离本质”的两种，是没有根据的，讲不通的。

那末，这不是说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在表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互相没有差别吗？不是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一，表现本质的方面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事物只有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往往是由几个互相联系的面组成的。不同的现象，表现着本质的不同方面。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有些现象则表现着它是组织新的经济建设的杆子（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正是由此三方面组成的）。二，表现本质的形式不同。假如象，是以和本相相反的形式来表现本质，而有些现象（如一个被捉反党反社会主义去教人）则是以和本质比较一致的形式来表现本质。但无论怎样，现象都包含着本质，表现着本质。同时，无论怎样，现象又不能和本质互相等同，直接合而为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

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在于怎么写。例如，同是写特权和不正之风，的确有暴露，但不那么成功，但也有话剧《权与法》、短篇小说《窃盗门》这样比较成功的作品；同样是直接写向四化进军的，确有揭露小说《开广厂上会记》、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这样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塑造了社会上新人新事而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佳作，但也有一些只是淡淡地描写一些好人好事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淡薄。所以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不管是属于主流的还是属于支流的，是属于光明的还是属于阴暗的，都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至于对它们的描写能否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关键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在于作者有没有善于通过现象展示本质的本领了。当然，每个作家在把社会生活现象写进一个作品时都应当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出于每个作品都只能以特定方式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而不是意味着有些社会生活现象根本不能进入任何文艺作品。如果硬是根据主观意志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两类，给许多社会现象贴上“不能反映生活本质”的封条，不许任何作家去描写它们，不涉及它们，那实际上就等于创作题材的素材划框框。其结果，必是局限作者的眼界，捆住他们的手脚，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变得贫乏、单调，使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路子越来越狭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作品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一个笼统的提法。具体到一个作品，所谓“本质真实”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

粉粹“四人帮”三年多来，文艺创作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坚持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表现了人民的心声，重新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血肉联系。这与整个社会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假、大、空”的恶劣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态度是紧密相联的。文艺坚持真实性，就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无论是生活中美丽的，还是丑恶的，作家都要真实地、爱憎分明地给予艺术的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文艺要不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

今年出版的《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向读者推荐了一篇《头脑是很清醒的》文章，编者认为文章的作者就是“今天发展文艺理论的正确希望之所在”。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如下一段话：

你说的那个时期（指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的社会，和这个时期（指打倒“四人帮”后）的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没有变，人们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标准也没有变，由那个时期的社会负责和这个时期的社会负责是一码事。如果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达到了他们可以主宰整个社会的程度，那个时期的社会是他们的社会，那就把他们都看得太高了。他们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那个文艺作品揭露批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罪恶，那只是只写现象，不写本质，“就记错了账，把社会现象的账记到社会本质上了。”

本刊物的评论员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进而说：“其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样的论调意味着什么呢？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了10年“大灾难”，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一个铁的历史结论错了吗？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法西斯专政，和今天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看成是没有“界线”的“一码事”，这符合事实吗？这样，三年多来大规模的叛乱反政，一系列重大的深刻的变革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些论点从政治上作更多的分析。需要讨论的是，这位编者和文章作者似乎都没有把握现象、本质这些概念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搞清楚，于是对文艺的真实性作了上述这种错误的解释和判断。

任何事物、过程都包含有现象和本质两个不同方面。本质表现的是事物的特性、内在的规律性；现象是事物和过程的外部表现形式。事物的本质是寓含在现象之中的，依靠现象这个外部表现形式为人们去认识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象和本质混为一谈，认为文艺只须停留在对现象的表面的罗列，不必去进一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是不对的，必须把现象和本质剥离开来，看成各不相同、互不联系的东西，把本质看成可以离开现象而存在，文艺似乎可以同社会现象表面貌何就可直接写出抽象的神秘的“本质”，结果必然成为主观的概念的演绎。这个刊物的编者和该作者的观点正是属于后一类。所以他们认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这样一些对社会发生巨大破坏和深重灾难的事物经过，看成一种不反映社会本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这又是一种多离奇而令人费解的理词啊！

社会生活是繁复的。因此各种社会现象包含着各自不同的特殊的本质内容，决不是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当然，人们在认识了许多不同社会现象的特殊本质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概括、提高、认识其共同的本质。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着重点还在于把握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同时，社会生活总是在发展变化、曲折起伏的运动过程中，本质也是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有些同志从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出发，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绝对的、绝对的美好，我们社会的本质就是美好。于是，就不敢正视，也无法正确分析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我们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曲折过程，当它腐朽了相当一部分权力，镇压全国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确曾处在统治地位，成了某个时期的主

流。我们除了从中国的大地上，从我们社会的自身去寻找本质的、内在的、必然原因，难道还能从另一个什么世界去寻找吗？对于这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生活进程中发生过如此深刻重大影响的事件，与亿万人民的命运、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生死攸关的事件，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应该通过文艺形象去反映、揭露、批判呢？作为作家为什么不能够表示自己强烈的义愤和正当的爱憎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同样，文艺也将成为不必要的了。但又正因为现象与本质经常并不直接相符合，所以才使文艺描写复杂生活有了广阔的天地。当前，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这说明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具体环节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在实践中证明并不都是美好的，相反有的是有严重缺陷的。这正足现实与本质并不完全相符合的表现。进行改革，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日渐得到完善和巩固。文艺创作反映这些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或将发生变化的各种繁复的现象，进一步揭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本质（包括某些缺陷、阴暗面、落后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反映得准确不准确，深刻不深刻是另一回事，是可以讨论批评的。但因此就指责什么“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地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未免有点令人听闻，这又怎么谈得到正视现实呢？

然而，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把反映了某些丑恶的、不愉快的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指责为没有反映社会的本质而加以否定，50年代就发生过，林彪、“四人帮”时期更是泛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有过。近来对于某些描写了阴暗面、落后面的创作，小说指责为不真实，好像仍然还是在重复我们社会的本质即光明理论的问题。在这里，重温一下过去的论述对我们是有所启示的。列宁曾经赞赏托尔斯泰是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因为在他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现象并非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并不了解工人运动和俄国的革命，他只是“反映了黑暗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个人经历，同时也反映了幻灭的孤独和绝望”。

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但正是这种矛盾思想，成了“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运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成为“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民”近纯陋劣的反映”。可见托尔斯泰主要的不是正面反映了革命运动如何汹涌澎湃，工人农民如何英勇斗争，如何打倒了沙俄统治，而是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缺陷和弱点，因为革命的某些本质也不一定是光明和美好的。而列宁的这些论述，在我们的同志看来，岂不要说，这算什么镜子？这是哈哈镜！

问题很真确，文艺真实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经常引起争论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特征，而是因为有没有写光明。不能否认，确有一些以写阴暗、写黑暗、写康生一伙罪行、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为旨，但是生编造、荒诞离奇、恶棍低俗的作品。如果对于这样一些作品事实来是地提出批评，当然是应该的。但问题发生在一类作品身上，即所谓写的阴暗的、落后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而被相当多数群众证明确实是，是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反复出现的。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东西，但与历史作家、艺术家所要求的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描写的原则却是一致的。这样的作品被指责为不真实，当然不能使人信服。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不庆事实，而庆写出”（鲁迅语）的古怪而不公正的看法。他们不敢正视生活中的丑恶事实，不去设法铲除这些污染我们生活的垃圾，不去批评这种罪恶的制造者，却一味靠暴露这些生活现象的作品，声明这些作品或者至少揭示了我们的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这说吗，即使今天，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或是表现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文艺创作要坚持真实性，仍然需要作家的勇气 and 胆识。

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

李 准

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不断地得到表现。同时，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笑一怒，又无不表现在某种社会事物的本质。“连泡也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具有着必然，既不可能有离现象而独立呈现的本质，也不可能有所谓“远离本质”、与本质无关的现象。就拿假象来说吧，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也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种表现。如林彪、江青一伙经常以上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一种假象，而它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混进党内并以假乱真出现的阴谋家的反动的本质的一种特殊规定，是他们不同于一般反动分子的一种表现。不描写这种假象，文艺作品就不能充分揭示这种阴谋家的反动的本质。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能表现本质的和“远离本质”的两种，是没有根据的，讲不通的。

那末，这不是说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在表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互相没有差别吗？不是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一，表现本质的方面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事物只有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往往是由几个互相联系的面组成的。不同的现象，表现着本质的不同方面。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有些现象则表现着它是组织新的经济建设的杆子（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正是由此三方面组成的）。二，表现本质的形式不同。假如象，是以和本相相反的形式来表现本质，而有些现象（如一个被捉反党反社会主义去教人）则是以和本质比较一致的形式来表现本质。但无论怎样，现象都包含着本质，表现着本质。同时，无论怎样，现象又不能和本质互相等同，直接合而为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

要求：其一，首先要反映出作品所直接描写的某个或那些具体事物的本质。如写某种人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人的本质，写官僚主义的作品首先要写出官僚主义的本质，写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选举的本质，如此等等。其二，要通过对于具体事物及有关现象的描写，从一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具体事物，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在一一定的时代，它的存在以及发展变化都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制度和时代潮流的制约和影响。同一类事物，如都是舍身救人，同是投机倒把，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和时间，表现形式不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所以，不管写的什么事，只要正确地写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正确地写出它的发展变化，正确地写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就自然会从这一特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从一定角度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趋势。王蒙的《说客门》主要是写不正之风的现象。在出类人物中，只有一自己一个人坚持党的原则，说客们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甚至连丁一的爱人也站在说客一边。可是，小说不仅通过对于说客们形形色色游说活动的生动描绘，深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这种不正之风的社会，写出了十年动乱以来一些善良人身上造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创伤，而且通过丁一始终未对说客们屈服后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我国当前社会潮流的一个本质方面：粉粹“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正之风的社会势力虽然乘势泛滥，“浩浩荡荡”，但一碰到敢于坚持原则到底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队伍就会很快“散光”。小说告诉人们，不管有多么艰难险阻，同四化进军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不容易的。如中篇小说《调频》，主要也是写不正之风的内容。应当承认，仅就其不正之风而言，小说是失败于现实表现的。但是，它却未能正确地写出这种不正之风的社会地位，表现出在描写形势下有什么变化，好象不正之风依然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它没有通过对于这种特定事物的描写反映出整个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这两篇作品的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一个作品究竟有没有多少本质真实，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如何。

